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高晓声

GAO XIAO SHENG

代表作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高晓声代表作

尹 骐 编

黄河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国钦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高晓声代表作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西里路94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14.25印张 316千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350册

统一书号：10385·81 定价3.35元



作者

陳英生上城

高曉声

“滿口香”之陳英生，今日悠々上城來。

一次寒潮剛過，天氣已經好轉。輕風微々吹，太陽暖烘烘。陳英生肚里吃得飽，身上穿得齊，手里提着一個裝滿東西的干淨淨的旅行包。也许是力氣大，也许是包兒輕，簡直象拎了束灯草，晃蕩晃蕩，全不放在心上。他身兒又高，腿兒又長，上城三千里，徑不愁他兒晃蕩：往常挑了重担都不乘車，今天子於是輕身，自更不用說。何況太陽也高，叫賊嫌早。他盡量放慢腳步，一路以游春看風景。

他到城里去干啥？他到城里去做買賣。積子收好了，菜地種定了，公粮余粮交掉了，口粮

凡 例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均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概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版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和注释。《前言》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等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了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Gom 8/18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编委会成员

主 编 李何林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家鸣 李何林 张学正

张学植 张菊香 郝世峰

崔宝衡 曾广灿 蔺羨璧

前 言

高晓声在文学创作道路上是一个探求者。

一九五七年，在那个令人难忘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里，年青的高晓声和他的几位志同道合者，在江苏南京发起建立了一个名叫“探求者”的文学组织，宣称要“干预生活，探求人生”。宣言发出后，颇引起了一些强烈反响。可惜时乖命蹇，这个以探求为使命的文学产儿，刚刚发出一声稚弱的呼号，便被扼杀在摇篮里了。它的组织者在劫难逃，受到了惩罚：高晓声戴上被错划了的“右派”帽子，回到自己的家乡——江苏武进县的农村，开始了漫长的劳动改造的苦难历程。

高晓声一九二八年出生于武进农村，家庭是中农。父亲有一定的文学素养，家中拥有一部分文学书籍。高晓声自幼受文学熏陶，读了许多文学作品，爱上了文学，做过“文学的梦”。然而只是到了他的家乡解放后，在人民革命取得天翻地覆的伟大胜利的历史条件下，他那文学的梦想，才获得了变为现实的可能。一九四九年，他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五〇年，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在此后的几年间，他边学边写，陆续写出了一些主要是以歌颂新社会和新农村为主题的短篇小说、诗歌以及剧本等作品。其

中，一九五六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解约》，是较为优秀的一篇，可以看作是他的创作的真正起点。在这篇作品里，他以简洁朴素的文字，描写了新农村的新一代农民在处理恋爱婚姻问题时表现出的新思想和新风尚。虽然还没有脱去稚气，但似乎已经能够见到作家在后来所形成的创作风格的端倪。一九五七年六月，他又发表了一篇题为《不幸》的小说。这篇后来被打成“毒草”的作品，实际上是高晓声为探求人生所做的努力的一部分。他把笔触伸向了革命队伍的内部，描写了一个满口革命原则，而实际上灵魂卑污，给妻子制造痛苦和不幸的伪君子形象，从一个侧面提出了知识妇女同样存在的妇女解放问题。把这样的作品说成是攻击党员干部的“毒草”，实际上不过是掩盖了现实中业已存在的一种社会矛盾罢了。不给作家“干预生活”揭露生活阴暗面的权利，只能是姑息和放纵了那些制造生活阴暗面的人们。历史实践早已提供了足够的教训。

文学道路上的探求虽然给高晓声带来的是“不幸”和灾难，但是高晓声却并未因此而改变自己探求者的性格以及继续探求的努力。在农村劳动的漫长岁月里，他虽然不曾在文学创作上探求出任何具体的成果，但在社会与人生的领域内，他却在不断探求中得到了重要收获。巨大的政治冲击波，使他不断地受到强烈的震荡，单纯的热情逐渐为深沉的思索所代替。当他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而且是以一个“政治贱民”的身份重新观察和认识农村的现实及其生活的底蕴时，他的视野开阔了，视觉敏锐了，思想也日益深化了。二十余年的风风雨雨，把生活在最底层的高晓声磨炼得更成熟了。真所谓“祸兮福所倚”，他在社会与人生领域内所作的探求及其收获，是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正是这些宝贵收获，为他的文学创作道路奠定了扎实深厚的基础。实践不久就

证明了这一点。

一九七六年的十月事件后，高晓声就象他笔下的陈文良（小说《极其简单的故事》里一个与高晓声有近似经历的人物）一样，迅速而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事件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及其必将产生的深远影响。他象渡过了漫长的冬眠期一样，立即结束了蛰伏的状态，重新拿起笔来，踏上了新的文学征程。当他一九七九年重返文学岗位时，已经写出并发表了好些作品，以累累的硕果迎接了文学春天的到来。一开始，他的创作视野就比较开阔。既写了类似他自己亲身经历的《系心带》，又写了“四人帮”猖厥时期，人民群众同“四人帮”及其爪牙作巧妙斗争的《雪地花》，还写了《特别标记》那样的表现一个人追随“四人帮”走过邪路而后又幡然悔悟的作品。不过，他最用力去描写的还是他最关心和最熟悉的广大农民的生活与命运。《李顺大造屋》、《拣珍珠》、《“漏斗户”主》、《漫长的一天》、《柳塘镇猪市》等作品，就是他在重返文坛后最初贡献的业绩。

《李顺大造屋》，以其反映农村历史的曲折性和农民命运的悲剧性，获得很大的成就，受到了文学界的高度评价。紧接着，作家又推出了以陈奂生为主人公的系列小说，在更深广的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农村的历史动向和农民命运的变迁。李顺大、陈奂生这两个典型成了高晓声文学创作事业的两块奠基石，人们也一致认为他是擅长写这类农民的高手。他似乎可以沿着这条已经铺好的路稳稳地走下去了。然而他不。他既不愿在题材和人物类型上把自己束缚在一两种固定的模式之内，也不愿在风格的探索上就此止步，虽然他已经被公认为是已经形成独特风格的作家了。他要继续走探路者的路，不断地开拓自己的创作天地。

在此后的创作实践中，一方面，高晓声大抵是以李顺大、陈

夹生式的农民为轴心，让他的这一类人物随着农村历史性的变革而不断地变化、发展，曲折地前进，同时又把视线扩展到农村的各个阶层和各个角落：干部、群众、老一代、年轻一代，他们的物质追求和精神境界，他们迅速前进的步伐和因袭的历史积习等等。另一方面，高晓声又从农村这个中心点幅射出去，将笔触伸向集镇和城市，让农村与城市互相连结起来，更加深广地展示出当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因此，我们看到的高晓声的作品所提供的社会生活画面就相当宽广而丰富多彩了。我们粗略地统计了一下，高晓声自一九七九年重返文坛至一九八四年末止，共发表短篇与中篇小说五十一篇，按题材大致分类，反映普通农民生活的是二十六篇，反映农村基层干部面貌的是六篇，反映知识分子和城市干部的是十二篇，反映工人生活斗争的是三篇，其他有反映“文革”时大串连、民间传说等题材的四篇。在上述各类题材的作品中，人物是各式各样的。就农村这个领域来说，高晓声几乎写出了各种农民群象的谱系，把人们引进了一个色彩斑斓的当代中国农民的人物画廊里。

高晓声在文学道路上的探求仍在继续着。近一、二年来，在体裁方面，他在继续写短篇的同时，开始创作中篇了；在题材方面，他在继续捕捉各式各样的农民在改革浪潮中的动向的同时，把视野扩大到了城市更高层次的机构内部，为城市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发出了激愤的呼唤（《极其麻烦的故事》）；在人物塑造方面，还推出了知识分子和市民中的魏建纲和赵娟娟那样的富有个性和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跌跤姻缘》）。毫无疑问，高晓声的文学探求之路还很长，未来的途程也决不会十分平坦。探求者的道路不可能不是漫长而艰辛的。他最近就曾感慨说，“探索的道路十分痛苦”。这并不是浮泛的自谦之词，而是实践者的真切

体验。然而作家想必也很清楚，探索虽有痛苦，但更有欢乐。不论是成功的探索，还是探索中遇到的挫折，都是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一种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探索的本身就是一种值得赞许的精神。我们期望着高晓声在探索的道路上坚持下去，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二

有人在评价高晓声的创作时，说他有“鲁迅风”，这当然是一种极高的赞誉。倘如说高晓声的小说已经达到了鲁迅小说的思想与艺术的高度，那是不确切的。至少现在作这样的评断还为时过早。但是说高晓声的一部分小说在某些方面具有鲁迅小说的一些特色，那就不算是过誉。这里所说的“一部分小说”，指的就是他的那些以普通农民为主人公的若干优秀之作。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上的厚实与深沉，创作方法上的清醒与严格，风格上的冷峻与幽默等，都是师承鲁迅或者可以说是独步鲁迅后尘的。

在表现普通农民的生活与命运的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已经获得了广泛称誉的李顺大、陈奂生式的农民典型形象的塑造。高晓声从这一类人物身上，极其深刻、极为丰满和极为生动地开掘并展示了当代中国农民的最真实和最具有特点的性格。他们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历史感，因而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他们已经不是旧时代的杨白劳式的农民了，但是他们从旧时代的历史传统中承袭了旧式农民的许多特性。例如勤劳、刻苦、善良、温顺、忍耐以及软弱、自卑、逆来顺受，甚至还有几分奴隶气味。我们只要细心品味一下“大好人江坤大”的性格，就足以使我们触目惊心了。这个被深深烙上了中国历史印记的农

民，是何等的可敬、可爱，而又可怜、可悲啊！他是那样的聪明能干，又是那样的忠厚善良，可是他竟又那样心甘情愿、心安理得地让那个神气十足，视群众为牛马的小官僚刘国光骑在自己的身上摆布自己。不过李顺大、江坤大们到底不是生活在旧时代，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胜利，使他们获得过翻身解放的幸福；新中国新社会，又赋予他们以当家做主人的权利。这些虽然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曾被减弱、甚至被莫名其妙地剥夺了，但是，深深埋藏在他们心底里的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感激之情，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思想与信念，却始终没有忘记，没有消失，并一直在起作用。李顺大的微弱理想虽历经挫折而始终不渝，便是他作为一个新中国新时代农民的写照。因此可以说，李顺大、陈奂生、江坤大这类人物，是伟大历史变革时代新旧交替时期的典型。就历史的深度来说，李顺大造屋三十年的坎坷历程，无疑是中国农民三十年坎坷命运的历史缩影。而陈奂生经历的历史跨度则更长一些，他的命运的起伏是更大的：从一个抬不起头的“漏斗户”主，发展到获得大笔奖金、踌躇满志的头面人物，并有点儿飘飘然，又几乎变成一个不思进取的保守人物。

高晓声的贡献，远不止是反映了一个时代农民生活命运的历史变迁，使人们“重新认识这一段历史的意义”（《〈李顺大造屋〉始末》），他的更重要的成就与贡献是在于：他以清醒的、严格的现实主义的精神，深入地、冷峻地探索和解剖了这些农民的内心中精神世界，也就是刻意师法鲁迅，要画出他们的魂灵来。在这方面，高晓声无疑是一位高手。凭藉他长期农村生活的体验和对农民深入而又精细的观察，他真正捕捉到了中国农民的灵魂深处所因袭的那沉重而深远的历史负担。作家是从这样一种高度来认识农民的这种精神负担的：“他们的弱点确实是很可怕的，他们

的弱点不改变，中国还是会出皇帝的。”（《谈谈文学创作》）在我看来，这决不是作家的危言耸听，因为有历史的前车在。农民身上的这种弱点，即他们精神上的阴影，在高晓声的笔下有着真实而具体的描绘。陈奂生就是一个出色的典型。他的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的种种德性，包括某些习惯性的圆滑和投机取巧的心理，以及某些保守、苟且、自尊、自卑、自我麻醉等等，都写得自然、真切，富于个性特色。为了弥补住高级招待所花冤枉钱所受的损失，他要故意去糟踏一下招待所的（也就是国家的，归根结底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人民的）财产；这还不够，他又想出了用吹牛的办法来抬高自己的身价，获得精神上的满足。真是天可怜见，时来运转，他的吹牛居然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因为和吴书记有过交往，他被别人当作一项资本利用了起来。而这位勤劳善良，种了半辈子田的陈奂生，一旦轻易地得到了高额报酬（几乎是不劳而获，至少是他自己这样以为）之后，竟又产生了不愿埋头种田的念头，反对起包产种田的责任制来了。还有可笑的是，当陈奂生被作家写进小说成了知名人物后，他竟也受人怂恿，准备打上作家的门，去兴师问罪和作家算帐，企图捞到点什么。

作家让我们充分地认识到，存在于农民身上、尤其是一部分落后农民身上的弱点，的确是很可怕的。高晓声以清醒的、严峻的和讽刺的笔触，给我们刻画了好些具有这种弱点的人物形象。《陈家村趣事》里的陈荣金、陈龙宝，《荒池岸边柳枝青》里的金六苟，《极其简单的故事》里的陈宝宝等，就都是这一类人物。他们都是劳动农民出身，可他们身上却有着许多的历史污垢与恶习。恰如鲁迅讲到阿Q时所指出的，他们“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寄〈戏〉周刊编者信》）

陈荣金的奸刁，陈龙宝的无赖，盘六苟的泼皮行径，陈宝宝的恶棍习气，都是一些活灵活现的典型性格特征，读后不能不令人掩卷深思。

在开掘农民历史的传统心态方面，高晓声的笔有时是冷峻得叫人心颤的。《钱包》和《鱼钩》是其中的代表作。故事简单而思想意境却深沉凝重。《钱包》中的黄顺泉及其周围的农民们，在豺狼当道，鬼域横行的世界里，却梦想着捞到那个装有三百块银洋的钱包，发一笔意外的财。结果，钱包是捞着了，引起的却是一场痛苦的灾难。它象是一篇古老的寓言，又象是一首现实的悲歌，耐人寻味。《鱼钩》里所写的那位捕鱼人刘才宝，自信是捕鱼之王，水中强手。在利欲的诱惑下去冒险偷鱼，结果葬身于深水激流之中。他也并不是非偷不可，而是被一种奇特的变态心理所驱使：“在刘才宝看来，世上得意事，莫过于自己捉到鱼，别人捉不到。而最惹气的，莫过于自己捉不到，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捉。”他就是不愿意看到别人捉到一条大鱼而自己捉不到，便决意捣鬼，潜水去偷别人捉到的那条大鱼，不幸被那条大鱼缠住了身体，沉入水底淹死了。刘才宝的这种极其自私、狭隘和愚蠢的心态，是令人吃惊的。而这种心态正是发生在这个劳动渔民的身上。《鱼钩》这篇小说没有写出明显的时代背景，我想这也许是作家有意为之。让人们思索得更广阔更久远一些吧。我国农民的这些可悲而又可怕的心态弱点，虽然决不是农民思想的主流，但它的传播、扩散，又岂是农民哩！惟其如此，才值得人们深长思之。

三

高晓声的视野当然不只是看到李顺大、陈奂生、江坤大这一类人物，也不会只看到陈荣金、陈龙宝、金六苟之辈，更不会把黄顺泉、刘才宝这类人物的悲剧看作是农民的必然命运。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新时代的新农民无疑正在成长，并正在成为农村的主导力量。作家所以用很大的气力，用浓墨重彩去描绘旧时代给农民身上留下的阴影，目的正在于帮助人们，也帮助农民自己清醒地认识农民的过去和现在，以便更好地涤去积淀心灵深处的污垢，疗救已有的痼疾，摆脱沉重的历史负担。就在反映上述普通农民及其传统的心态与风貌的同时，作家的视觉也不曾忽略农村正在出现的巨大变革以及在这一变革中所引起的新与旧，传统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水东流》、《泥脚》就是这类题材的力作。《水东流》里的刘兴大，是一个典型的勤劳致富、勤俭持家的传统农民。当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冲击着他的传统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时，他是那么看不惯，不习惯。他仍然企图用自己的传统生活与思想的模式去规范自己的年青的女儿。然而受现代化新风吹醒了的女儿淑珍却不能忍受那传统模式的束缚而要过一种新的生活。她对旧生活方式提出了挑战，喊出了“这日脚过了有什么意思”的呼声。于是父女之间出现了尖锐矛盾。有趣的是，刘兴大的老婆、儿子、媳妇也都是“淑珍派”，这就使他企图固守的防线不能不被攻破。历史就象一江春水，奔腾地向东流去。但这引起的不是叫人感伤和惆怅，而是让人感到轻松愉快。因为这不是悲剧，而是喜剧。《泥脚》里的矛盾比起《水东流》来更深沉一些，分明有着悲剧的氛围。朱坤荣这位勤劳的农民，一心

想着发家致富，而眼光却又十分狭隘与保守。为了快快发财，他竟以牺牲自己子女们的前途和幸福作代价，压抑着、甚至摧残着下一代人的读书、进取、休息、娱乐，以至于恋爱的正当愿望。特别是他那种轻视文化的愚昧观念，确乎让人悲叹。“读书无用论”原来并不是个别极左人物的心血来潮，而是农民小生产者狭隘保守心理的曲折反映。这是发人深思的！在朱坤荣统治下的家庭王国里，新一代的愿望与要求，暂时还没有得到实现。这也并非是作家的悲观，而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阴影的确还非常浓重。在无数个家庭这一角落里，旧思想旧观念还处于优势的地位，这不是更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么？！

高晓声还以满腔的热情描写了农村中正在涌现出来的崭新的农民形象。他在早几年的作品中，就给人们介绍了一批新人，例如《拣珍珠》里的刘新华，《磨牙》和《丢在哪儿》里的陈禾秀，《崔全成》里的崔全成等。在最近两年的作品里，他又随着农村改革形势的发展，为人们推出了更高度的新的农民形象。例如《蜂花》里的苗果成、张静静，《荒池岸边柳枝青》里的张清流、张清泉兄弟，《极其麻烦的故事》里的江开良等。这些新人一个个都是朝气蓬勃、个性鲜明。刘新华和陈禾秀这两个农村女知识青年，性格是那样单纯、质朴、开朗，思想又是那样的高尚和纯正。她们热爱农村，热爱农民，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特别是在处理婚姻恋爱问题时所表现的那种思想境界和质朴的追求，令人觉得可亲可敬。崔全民这个新型农民，脚踏实地，精明强干，心胸开阔，精神境界颇高，他的身上凝聚着新型农民的种种美德。而苗果成、张清流、江开良这些人物，严格说来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开拓性的农村事业家了。在他们的身上，旧式农民精神上的弱点的影子完全看不到了。这是格外令人欣喜的。